

又火上浇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

被破坏事件的回忆

内容提要

引言

1.

一、我和党的关系

2.

二、事件的起因

8.

三、第一次捕人的情况

14.

四、第二次捕人的情况

15.

五、在“看守所”的情况

21.

六、获得自由

25.

七、尾声

27.

其他可供参考的情况事项

29.

X X

X X

X X

3. 言

这是距现在(1982年8月)五十二年前的事。我亲历其事，回想起来，犹有余痛。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刘少奇同志已回中央)，轻率妄动，竟使多年来艰苦积蓄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毁灭，是立三路线的恶果。

加以当时对秘密工作规则，未严格执行；

又火上浇油地加重了这一事态。每一念及，是很为痛心的。

由于出现了两个叛徒——杜兰亭、陈尚哲，竟能带领或指示敌人捕去二十七、八个人，包括党团领导、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使东北革命，遭到很大挫折，是极为惨痛的。

有的记事，说捕去三十多人，有的甚至说是捕去四十多人，是付属失实的，不可置信。这二十七、八个人中间，放了两个叛徒（杜兰亭、陈尚哲），还放了所谓“另案办理”的崔国政等六七个人；剩下了十九个人。这十九个人被一起拘留近二年，到1932年1月，才一同获得自由（参看后文）。

一、我和党的关系

在叙述这一事件之前，先说我和党的关系。

1927年春（我虚岁十九），我去武汉。考入当时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成了军官候补生。在总政治教官恽代英同志的教育下，思想激进；认为要革命就

必須加入中國共產黨。

蔣介石叛變後，使夏斗寅獨立師來攻打武漢。我旅一千四百餘人，組成一個團。女生三百餘人，弄一個營；其餘男生，兩個營。加上叶挺的一個團，編成中央獨立師；叶挺擔任師長。在武漢南“紙坊”和“土地堂”打了兩仗，把夏斗寅打跑了，保住了武漢。

在第二仗中，我勇敢作戰，負傷；住進在武昌的^設後方醫院。傷愈出院，軍校已解散。有些同學去南昌，參與了八一武裝起義；其餘星散，不知下落。

我遂回漢陽，找到有關的人^{介紹}，加入了共產黨。192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和我談話時，還對我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時入黨，予以贊揚。

當時軍校同學有鄧魯風，是遼寧省遼陽縣人，東北人民政府時代曾任教育部長，後任人民大學及北京大學副校長。以後知道的，有趙文樺，現在吉林省糧食廳工作，1928至1929年曾在中共滿洲省委秘書處工作，在林江反革命

集团迫害刘少奇同志时，他曾写过材料，说
于1929年秋少奇同被捕时曾参与营校工作，详
见后文。另外还知道臧克家、符浩，也是当时
军校的同学。

1928年（我虚岁二十）春，苏子元同志当时负
责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命我去台安县“中共特支”
工作。公开身份是台安县立第七高级小学校址
黄砂坎级任教员。校长王统一心斋同志是支部
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搞了青运工作，发展了
一批团员。还办了农民夜校，搞些启蒙的农民
运动。

1928年暑假后，党命我去铁岭县立师范中
学合校当教员，教师范中学各一班的“国文”。因
为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仅仅搞些启蒙的青运
工作，没有发展组织。

同年秋冬之交，党命我回沈阳市，以利于
地下工作。恰好这时东北军阀头子张学良设立
了专门研究汉学的“东北书院”，自任院长。招收
大学毕业生五十人，再行深造。请了三名国学
大师，做为教授。王树枏（晋卿），进士，当过新

设布政使，主教“经学”；吴庭璜（何之），讲“史学”；
 吴震生（北江），讲“词章”。另外，还有些讲师等。
 我因从七岁起，连续读过九年私塾，通读了四
 书五经，学写做诗词及八股文，有汉学基础，
 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这样，回沈阳，既当学
 生，又做党的地下工作。这个“华仲书院”，后来
 并入“东北大学”，成为该校“国学系”的研究机构。

“书院”是研究机构，并不天天上课，而且位
 校、通学都可。党为了地下工作方便，要我通
 学。恰好这时我妻的姑父文运春（沈阳市人）在吉
 林市当个小官，在沈阳市小东关“关帝庙南胡同”
 有一所“三正三厢”共六间房子，命我代管。我携
 妻住正房一间，其余出租。

我当时除在“华仲书院”学习外，兼任张学良
 设立的“同泽女子高级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又兼
 任张学良授意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秘书
 ，所以经济情况是好的。

党因为女同志太少，无法租房搞“宣传部”机
 关，命我设法。我遂将代管房子中的两间正房
 给“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做机关，由我们掩护；

房租也基本上由我代付。

因房间宽大，故又兼充开会场所。

做为宣侍部机关，宣侍部干系四川人、修路营男，住在那里。直到1930年2月，他才离去。他的来去，都是我代报户口并注销户口的，当地公安分所有案。

做为开会地点，自刘少奇同志以下，许多人都在那里开过会。我妻也是党员，守门站岗放哨，人称梁大姐。她1906年生，现仍健在，往事还犹记忆。

XX

XX

XX

当时是共青团员、东北大学本科学生后来成为叛徒的陈尚哲，居然也出入我掩护的宣侍部机关兼会议场所，可见秘密工作规则执行的不严格了。敌人捕我时，就是他领来的，以后还要提及。

XX

XX

XX

1929年秋，我受党的指示，曾经营救过两个人。

一是名工人，在做宣侍工作时，被人扭

送至高坪警察局管下的一个派出所。我以酗酒打架为理由，求我堂兄郭庆益他当时是这个局的捐务主任帮忙，他打了一个电话，便使那一工人获得自由了。

另一人便是刘少奇同志。他是在纺织厂门前被捕的，纱厂女工多，可能有时稍挑逗有嫌疑；厂外堆料多，可能被怀疑为盗窃。我便以与政治无关的“罪在即盗”为理由，求我堂兄郭庆益帮忙。主持其事的司法主任便以此为理由，叙述在送“检举书”的定方中；结局以“部下”告终。少奇同志获得自由了。

林红反革命集团为了诬陷刘少奇同志，常逼迫原“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同志及该处赵文栋同志，他俩都说是我营救的。因此，林红反革命集团将我拘留近二年，软硬兼施，要我还发刘少奇同志。我被折磨成骨性关节炎，也没有说任何歪曲事实的话。我的笔迹，是现存卷52卷175页。廖如愿的笔迹，是51卷19页；赵文栋的，是52卷。这些案卷，现存“中共中央组织检查委员会”。

1929年秋冬之间，苏奇同志命我去上海党中央短期学习。同一组的共三人：另二人是赵尚志和李维周。赵尚志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已于抗日斗争中牺牲；李维周同志原在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工作，现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常委，正在统战与文史工作中努力中。

由党中央受训回来后，我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秘书”，协助组织部长做了一些工作。直到1930年4月被捕为止。

二、事件的原因

在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为了显示力量，乘东北军阀张学良投意搞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开讲演会之际，派人去演说反帝，被捕者三人，是这个事件的开端。

所谓“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以下简称“外协”），是东北军阀张学良投意组织的。它是讨好日美两个帝国主义，搞两者之间的平衡的，当然也反对苏联的。有人竟然说它是进步的爱国组织，那完全是错误的，绝对不能相信。

这个会共有九名所谓“委员”，都是张学良同

意的。他们是：

卢广绩(乃康)

辽宁省商会副会长

金哲忱(振忱)

同 正会长

王金川

东三省官银号总稽核

苏上达

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

阎宝仁

消费合作社经理

刘大夫

辽宁省财政厅稽查员

徐 晟(士达)

辽宁省建设厅科长

卞宗五

辽宁省立图书馆馆长

阎宝珊(玉衡)

辽宁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他们或为资本家，或为官僚，一句话，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只有阎宝珊一人，在抗联中入党，成了革命战士。

这个会的设立，是卢广绩(商会副会长)何汝学良讨的旨意因而组织的；何以大权在卢的手里，他说了算。一切活动，由卢主持；用人权，由卢子算；活动经费，即由商会费用开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阎宝珊当时只不过是九个所谓“委员”之一，不起什么大作用；更不是什么“主席”。有的记者，不但美化“外协”这个机构，而且指

高丽宝珍的身份，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应当予以驳斥。这实际是对该同志的污辱，故不足取。

“中共滦州商委”对这样一个亲美、反苏的所谓“外协”，非常注重。命我打入该会，以便经常地了解它的动向。

我于是千方百计地进入了该会，成了一名“秘书”或名“干事”。该会共有两名秘书，另一人是朱瑞阶，是“外协”主要负责人。卢广绩（商会会长）的“沈阳高级师范”同学。此人现在还活着，年已六十餘，是“辽字省人民政协”的办事人员，我们的同志李维周，便是他的上司。

在两个秘书之下，还有几名雇员，一为郝喜周，是卢广绩的亲戚；一为佟某，是卢广绩任用的。此外还有，也已忘记。

如前所述，该会以卢广绩为主，操纵会务，并有任用办事人员的实权。会址即设在“辽字省热河阳市商会”之内，经费也由商会开支。会址在商会院内一所东西走向的三层楼以上，楼下是“商报社”。这样，一进大门，路北便是。再往里走，便是商会的主楼。

商会主楼面向东，正对大门。东、南、北三面，都是二层楼。东面楼上是会长室及会议室，
 南北楼为各个办公室。西为一层的大会场，可容四五百人。大会场西头是主席台，高一米多。长宽各约两丈，时常在上面演剧。

“外协”开“委员会”，利用商会的会议室；大会，即利用商会的大会场。

“外协”经常开讲演会，请人讲演。题目多为文化、教育、讲科学除迷信等，与政治无关系。每次开会都印有入场券，以示限制。常有结余，以资招徕。为了维持秩序，均给东北宪兵司令部“去信”，请人监视当时警察只管民刑事纠纷，故向束不通知。每次开会，由九个委员中一人主持会场；我和朱焕阶两个秘书，轮班在会场照料。入场券由商会门前的“会房”（商会卫队）代收，既替商会把关，也替“外协”把关。每次开会的情形，大致如此。

“外协”每次开会，不论内容如何，均向党汇报。党认为与革命工作是无关的，就不去管它了。

1930年4月这次会，名“泛太平洋会议讲演会”，是吹捧美帝国主义的；所以党特别重视。原来，美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起步较晚；因而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号召，召开一个泛太平洋会议，做侵略中国的跳板。东北军阀张学良为了投靠美帝，命令原美国留学生、现为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外协”委员之一的苏上达去参加“泛太平洋会议”。“外协”开会，请苏上达演说，就是这个道理。

这次“泛太平洋会议讲演会”，由“外协”委员之一、商会副会长庾广续主持。而招待会场，按轮班由我负责。党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订策安全，将发给宪兵司令部的信；二是要入场券二十张，预备班一人去演说反帝，~~派人~~去呼口号、鼓掌助威。因为是我值班，所以都毫无阻碍地做到了。

由于“立三路线”做怪，党不仅派人去演说，还派多人去呼口号、鼓掌助威，以暴露了自己；而且没有部署任何应变措施；遂酿成第一次有人被捕的恶果。

当晚，卢广绩主持会场，做了简单介绍；即由苏上达开始演说。他们二人，都是在主席台上的。

这时，我受派去的赵高志同志，站在听众席第一排中间的中间，面向听众，演说反帝。把苏上达的话打断，苏木立台上。

卢广绩立即由主席台上下来，问我：“给陈兴五司令部的信发了么？”我做说：“发了”。他又问：“为什么没有人制止这个人的演说？”我说：“不知道”。卢怒气冲冲地说：“我给陈兴五司令打电话去”，便到楼上“会长室”去了。

当晚，一位女党员张光琪同志也去了。她携带传单，混到楼上，预备散发。听到卢广绩用电话告密，感到危险，便没有散传单而溜走了。这是以后了解到的，是卢广绩当晚告密的有力证明。张同志现已年过七旬，还健在；居住在沈阳市。

卢广绩的告密，是他的个人独断行动。和当晚演说的“外协”委员之一的苏上达没有关系；和当晚不在场的“外协”其他委员，也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

我当时感到不好，但因党省委并未佈置任何应变措施，我只好频频以目向赵尚志同志示意；可是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毫不理睬我。他讲了约一小时，方才完毕。苏上达这才继续讲下去，草草完毕。然后，散会。

三第一次捕人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党省委派来了一个人，他是昨晚自始至终参加了那个演说会的。他说：“昨晚散会，在退场时人们争相外出的比较混乱之际，由两个便衣夹一人，共捕去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三个人。”又说：“赵尚志演说，目标显著，当然必会被捕的；杜陈两人，低着头喊口号并鼓掌，被认为可疑，所以也被捕了”。

其次，他向我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即所有党团员，都要给商会会长唐广绩写信，每人至少十封；命令唐广绩放人。理由是在商会院内捕的人，商会会长有重大责任，是罪魁祸首。必须这样做，来逼迫他。大家都这样做，人多力量大，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将不得不放

法放人的。

我还问他：“我要否搬家？”他说：“这是群众反帝斗争，关系不大，似乎可以不必搬家”。他又说：“但还是要请示一下，再告”。以后，首先指示，所以我终于没有搬家。

这天，我到“革新书院”和“外协”转了一遭，当即买了不同街名的各中等学校的信封十多个，写了十多封同情信，寄给了卢广绩。以后了解时：别人都没有写，只有我写的十多封信；卢广绩一核对笔迹，就发现是我写的。因此，他向“宪兵司令部值线处长雷恒成”说，要严办郭某（我）。这就成了我“煽惑法团领袖”的罪状，因为卢广绩是商会副会长，按旧社会的法理认为是“法团领袖”的（参看下文）。

四、第二次捕人的情况

“外协”委员之一、商会副会长卢广绩向“宪兵司令部”陈兴亚告发：陈兴亚命令“宪兵值线处长雷恒成”捕去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三个人的事，已如上述。在“受审”时，赵尚志侃侃而谈“反帝”的必要性，等于当面训斥敌人，使其无话可答。

敌人老羞成怒，就用刑法威吓逼供；赵高老同志魂不在乎。因此敌人说他是“滚刀肉”，束手无算了的。

敌人遂改换方向，紧逼杜兰亭、陈尚哲。

这两人，先还好；第二天晚上叛变，第四天一大早便带同或指示敌人捕人了。

敌人要兵镇守处的人很多，那天全体分班出动。从早上三时许到晚上十时许，到处去捕人。

我是那天一大早就被陈尚哲带敌人捕的，陈当时还假惺惺地说：“他是房东”。因为我代管房子，常把房子转租。

以后了解则：有些人是杜兰亭、陈尚哲做“眼线”，带敌人捕的；有些，如第一师范和另一中学的四个学生，兵工厂的三个工人，杜陈就没有去，敌人自己去捕的。

敌人凌晨三时许出动，到晚上十时许，将所要捕的人，都已捕到。在晚上约十时到十一时的中间，敌人对于所捕到的人，一个一个地点了一次名。

敌“笑兵偵緝處”設在沈阳市小西門外的一
所破廟內，正殿很大，是偵緝人員的宿舍；西
廡房的北頭，便是“偵緝處”長高恒成的辦公室。
當晚十至十一時許，把我們一個一個地大聲呼
喚到廟的門外，門燈大亮，很清楚地看明我們
的面目。後來聽說，除了高恒成要看外，不給
充當張學良秘書的一個叛徒看。

我、宋小坡、王心齋、王松山、方景清、
呂鳳祥和崔國政等，被關押在正殿。所以叫名
的聲音、腳釘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連我們
這六、七個人在內，共是二十五六個人。當晚，
第一次捕的趙尚志、杜三亭、陳尚哲三人，不
在點名的人以內。

點名的次日，開始“過堂”。

對於我，據說有三大罪狀。第一說我“反帝”
是給國家外交找麻煩，我說這正是給外交做后
盾。第二說我和徐路雲合謀辦刊物，內有“章雪
亮”的名子，顯然是影射東北政府首腦張學良；
我說徐是我代管房子的房戶客，來和走，誰出
何都有根據。敵人調查了，證明報戶口、註銷